

第2輯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第二辑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印刷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 $\frac{1}{2}$ 印张 294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74 定价: 1.30元

限国内发行

# 目 次

- 
- 1 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周 锡 瑞  
江 枫译
- 41 近期日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石田米子  
宋绍柏译 傅中午校
- 66 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菊池贵晴  
邹念之译
- 125 辛亥革命与孙文、宋教仁  
——中国革命同盟会的解体过程……………久保田文次  
朴成昊译 邹念之校
- 163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白 吉 尔  
黄庆华译 胥 森校
- 226 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论 1909—1911 年中国的君主立宪运动……………  
……………IO. B. 楚多杰 耶夫  
李金秋译 邹 宁校
- 246 辛亥革命与中国陆军……………冯 兆 基  
吕 浦译
- 274 1911 年南北和议之重新考察……………L. 西格尔  
丁贤俊译 吕 浦校
- 297 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和社会  
因素的相互关系……………齐赫文斯基  
蔡静仪译 江 枫校
- 308 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沈 巨 光  
黄光域译 吕 浦校

330	中国革命与幸德秋水·····	石母田正
		李士苓译 曲 直校
340	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	竹内善朔
		曲 直 李士苓译
361	编后记	
362	稿约	
329	补白	

## 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

---

辛亥革命的光辉，早已因随后发生的那些伟大得多的革命斗争而相形失色。之所以会如此，自有其原因。它本来就不是一场十足的革命，有人甚至从根本上怀疑它是否配称“革命”（兰金，1971：序言）。<sup>②</sup>然而，它毕竟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统治。君主政体已被共和政体取代——尽管这种共和完全不是中国和西方共和主义者心目中所向往的那种东西。作为君权合法性理论根据的儒家学说也已被永远摧毁——即使说在以何种学说来代替的问题上尚看不出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把通常用得并不十分严格的“辛亥革命”这一术语用来指称从1900（甚或从1895）年起到1913年止的整个历史时期，则那一时代的意义甚至会更加明显。科举制的废除，摧毁了确定士绅地位的传统准则。商会的成立，允许、甚至鼓励商人参政。政治方面的改革，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使地方名流掌握权力作为制度得到承认。新军的建立，使军人得以享有足以和对等的文职官员相抗衡的“新式”声望。而推动这一系列改革活动的动力，则是对于帝国主义行将瓜分中国、乃至灭绝中华民族的强烈恐

---

① 周锡瑞(Josef W. Esherick)系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在该校讲授中国历史并主持一个亚洲研究计划，曾和谢尔(Orville Schell)合著《近代中国：一个新社会的形成——自1839年迄至今日》一书，也是《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J. S. Service)文电稿汇编》的编者。

② 意即参见兰金(M. B. Rankin)1971年所著书《文》，书《文》名见本文所附引用论著目录，下同。——译者

惧所激发起来的普遍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这一类改革的重要性的正确评价，已使辛亥革命成了研究现代中国起源的史学家的热门课题。本文评论所及的著述，大部分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仓猝从事的活动成果。然而，这仅仅是开端。更新的论著不久就会出现，并将大大丰富和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地：正在产生出史料来源和研究题目相互重复的成果。虽然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一直是依据只能就从未接触过的课题著书立说这样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原则发展起来的，但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目前这种状况的优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而我（至少是我）深信，在已经涉猎过的那样一个广阔的领域里，很少有什么题目不可以重新再做。

说有不少工作尚待我们去做或重做，并不意味着贬低已经取得的成就。事实上，这一长篇评论的基本写作原则，是试图摆脱陈旧的正统观念的羁绊，而以对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变革所作出的日益精细的分析为线索，回顾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但是，日益发展的精细程度也带来更大的复杂性。随着原有问题的解决或放弃，新的问题又代之而起。本文将着力评论每一连续性成就所引起的新问题。我对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怀有同等的兴趣。因此，本文的结构虽着眼于发展，其内容却基本上是评论，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一举而兼收亦述亦评之功。

## 孙氏中心正统论

只需对谢文孙(Winston Hsieh)所著《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1975)这一有价值的文献叙录略加浏览，就可以对有关这段历史的阐释性工作已经取得的进展有所认识。谢氏认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正统学派”是孙逸仙在其政治生涯中最不得意时

所面临的历史处境的产物，并描述了这一“学派”在当时的独特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状况。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匡流亡而且被不少先前的革命伙伴所抛弃的孙氏，需要有一套传奇式的故事作为坚持其政治领袖地位合法性的依据，那就是后来出现的关于孙氏对于缔造民国所作贡献的神话。用谢氏的话说，“是孙氏自己的队伍对他的领袖地位提出异议……这才促使他那一集团断言他是整个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和先驱”（谢文孙，1975：第18页）。

孙氏在这一时期的著述为支配着1949年以前中国编史工作的那种正统观念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编纂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一套精心构制的以孙逸仙为其主角的密谋说。据这种说法认为，是集结在同盟会内的、由激进的华侨所组成的他的嫡系队伍单独推翻了异族的满清王朝，迎来了共和政权的新纪元。谢氏对于这种正统观的形成的描写和详尽阐述无懈可击。他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编纂学应该被看成是“新正统观”的论点也同样有理有据。正如他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出版的一切重要文献汇编，也全都是孙氏参加过的那些革命组织的编年史为依据而组织起来的。

但谢氏对这种历史编纂的马克思主义新内容的态度，显而易见是不赞同的，因为他一再提到（第59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应用”和由此而引起的“理论和实际的脱节”。他有点老派观点，他对“历史的客观性”（第4及第33页）以及“史学家探索和揭示真理的职责”（第1页）怀有爱作善意理解的宽厚信念，使他难于承认他自己对中国编史状况的概述（第41—63页）所显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关注，已在辛亥时期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引起了影响极其深远的问题。尤其是，大量的精力被耗费在秘密会社、新军、革命党派和立宪派之类关键性集团的阶级特性和政治作用方面。

我认为，这些都是由历史编纂理论所产生的严重的缺陷。



但是该著作的宗旨在于为有关研究提供适用的文献介绍，这种价值它倒是具备的。任何人想要在辛亥革命史的领域内从事一项较为重大的研究，都不能不从利用这本书入手。只有两点应该提请注意：首先，遗憾的是，谢氏的威妥玛—翟理思(Wade-Giles)式汉语拼音是不足凭信的，错讹之处比比皆是；其次，对于一部有实用价值的书目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纯原始资料，该书竟未收录，这就意味着对于本文评论所及的其他论著极为重要的报纸和档案资料没有被提到。希望不受谢氏经常暴露出来的那种正统编史观点拘束的研究者，就不能满足于他所提供的根据正统史料编成的书目了。

当我们转而论及关于辛亥革命的其它著述时，超越正统范围的必要就会显而易见。本文所评论的八部专著，有六部是集中研究通商口岸和海外革命党派的某一或某些成员的。而当我在下文论及清末新政、立宪派活动、资产阶级、民众的不满，以及我认为是这一时期内影响深远的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时，谈到的基本上是一些论文，而大部分的专著则尚未问世。

就本文评论的这一批专著而论，最接近于正统观点的是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的《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968)一书。由于是到孙逸仙个人身上去寻找中国革命的起源，史扶邻就必然要接受旧有的正统观念的核心信条。然而，这仍是一部不能轻易忽略的著作。史扶邻的学识就其狭义的内涵而论，堪称上乘：这本书有研究、有分析、有文采，颇有价值。最重要的是，尽管在阐述他本人的结论时十分谨慎，但是在应付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却毫不犹豫。出色的一例是他对孙氏革命作风一个令人难堪的侧面——在为实现革命宏图而奋斗的过程中，喜欢同西方和日本的最富于冒险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处理。

扬森(Marius Jansen)在他那本出版于二十年前的著作《日本人和孙逸仙》(1954)一书中，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孙氏和日本朝野扩张主义分子的广泛接触。奥尔特曼(Albert Altman)和史扶邻近

年又使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一类接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孙氏非但拒不反对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甚至还接受了一笔总额为二百四十万日元的款项，组织了日本人资助下、以推翻袁世凯为目标的几起军事密谋之一（奥尔特曼及史扶邻，1972）。法斯（Josef Fass）（1967）提请人们注意，孙氏曾在1917年向德国人索得二百万美元，以帮助他建立对抗北京段祺瑞政权的护法军政府。最后，回到辛亥革命以前的时期，蒙霍兰（J. Kim Munholland）的一篇文章（1972）和巴洛（Jeffery Barlow）的一篇范围较广的论文则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孙氏曾依靠过在巴黎以及在越南的法国扩张主义者，尤其是在1906—1907年那一时期。

这些事件全都发生在史扶邻那本书所涉及到的时期以外（那本书论述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止），但是史扶邻却广泛报导了1895年孙氏和一个对英开放口岸报人侵略集团的瓜葛。他在这里毫不含糊地问道：孙氏及其集团，究竟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史扶邻，1968：第77页）。虽然他可以谅解地（即使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显然倾向于认为孙氏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为“兴中会的亲西方立场”设想出了“民族主义的理论依据”（第79页）。史扶邻不认为孙氏及其集团“愿意牺牲中国的主权仅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1968：第79页）。他争辩道：

他们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他们都经过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知识和精神的培养。他们这类中国人，是通过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西方评价标准的眼光去评价他们自己国家的制度的。他们真诚地认为，必须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把欧洲的行政和司法准则强加给中国——至少在开始阶段应当这样。

这种解释似乎是透彻而有说服力的，但是当我接触到孙氏的外国盟友不是英国人而是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时候，对此就难以接受了。于是史扶邻又争辩说，虽然孙氏“理智上信奉”西方的价值观念，但

是他在“感情上”却依恋日本：“日本总是得到他特殊的考虑和容忍，因为尽管日本也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进攻，但在孙氏看来，它仍然是一个‘天然盟友’，因为它和中国同是东亚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并且同是西方侵略的受害者。”（第146页）。但是，如果说孙氏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精神产物”，人们就不禁要问，他又怎能从中日两国“共同的东亚文化遗产”中感受到什么样的吸引力呢。

政治性传记是一种极难处理的历史体裁。为了唤起人们对于传记主人公的兴趣、热情和同情心，史学家经常情不自禁地使解释变成辩护，并且让当然是传记核心的主人公显得也象是各种事件的核心。史扶邻也许就过份屈从于这种倾向和关于孙氏在革命中所扮角色的正统观念。例如，正统观念要求把孙氏看成是兴中会的缔造者和领袖，接着，就必然要求把兴中会看成是赞成实行共和革命的政党。史扶邻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1895年，孙氏“已经在夏威夷创立了这个组织……同时也被尊奉为香港兴中会的领袖”（第51页）。他还多次论证，以维护兴中会是（甚至在夏威夷阶段就是）一个共和主义组织的说法——尽管没有任何文件能对此加以证实（第43页）。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杨衢云<sup>①</sup>曾“控制了这一运动的财政大权”并因而被选为该会会长（第68—70页），而“在政策和纲领问题上”，孙、杨都听从何启的主张（第70页）。而再过七页，我们就知道，由于听从何启的主张，共和主义的目标就被推迟了（第77页）。当我们（有点不可思议地）知道“还有证据表明，当时主张共和政体更为坚决的是杨而不是孙”（第69页）、而孙在同一时期还和直言不讳的君主制拥护者广州进士刘学询进行合谋的时候（第64—65页），则所谓孙氏主张共和就更加可疑了。史扶邻在把孙氏计划和纲领中存在的所有这些矛盾公之于众方面，无可否认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总是用“灵活性”（第77页）或“孙氏在性格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第65页）等语词来加以解

---

<sup>①</sup> 关于这位被人遗忘的有趣的人物，可参阅薛君度：《孙逸仙、杨衢云和早期革命运动》一文，载《亚洲研究》第19卷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页。

释,却有点令人困惑。性格上的实用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界限究竟何在?

史扶邻此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结构和论点。它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同盟会创立的书,它既夸大了孙氏在建立同盟会上所起的作用,又夸大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史扶邻写道,“到1905年中,他[孙]就把本来是各不相关的、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忍受满族统治的人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第347页)。这种断言孙逸仙一手缔造了同盟会的说法,在别处(第8页)还提到过,而且,同盟会的力量和团结范围都被加以过甚其词的描述。在史扶邻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一个现代政党的雏形……这个新的组织得到全国各省的支持,而且是多阶级的”(第8—9页)。孙氏生平第一次指挥着“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人力和人才”。十分遗憾,把同盟会当作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治组织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幻觉,而史扶邻居然会以这样一种绝对的口吻加以承认,这和他的学术素养颇不相称。

## 革命传记的危险

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辛亥革命研究中以孙逸仙为中心的正统观念,有两部传记可以充当直接的替代物:一本是关于黄兴的著作,问世较早,质量较差;另一本是关于宋教仁的,出版时间较近,质量则好得多。1961年,黄兴的子婿薛君度发表了他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这是一部坦率表达孝敬之意的作品,薛氏公开谋求把黄兴提高到和孙逸仙平起平坐的地位,声称他是“中华民国的两位缔造者之一”(1961年:第vii页)。但是立论偏颇,难以令人信服。黄氏的一切缺点,都被冠冕堂皇地掩饰起来。最引人注目的,也许可以说是薛君度公然不顾十几个目击者相反的陈述而矢口否认黄兴在1911年11月清军渡过汉水重新攻占汉阳后曾经主张放弃武昌(第118—119页)。而该书更为严重的一个缺点是它完全照抄

正统派所谓辛亥革命的成功来自兴中会和同盟会所领导的“十次不成功的革命尝试”这种说法。薛氏所要做的仅仅是强调领导了其中大多数行动的是黄而不是孙(第56页)。他完全接受了关于同盟会在革命运动中团结统一和起着领导作用的神话。

刘基胜(K. S. Liew)所著《争取民主的斗争》(1971)一书的重要贡献,是他彻底摧毁了同盟会团结统一的神话。仍然有兴趣相信同盟会——也许1905—1906年那一短暂时期除外——象史扶邻所说的是一个由孙逸仙“所指挥的”、“有组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人们,都应该读一读他的第六章(第68—84页)。用刘氏的话来说,同盟会“更象是一些省份的联合会……而不象是由一个个成员组成的单一组织……党员首先效忠的是他们各自省份的领导人而不是中央的权威当局”(第68页)。因此,离心倾向很快就把这个组织撕扯得四分五裂。当孙逸仙和黄兴于1907年为了国旗的设计方案而争吵时,宋教仁对孙氏的领导作风有所感而说他“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第71页)。此后不久,当孙氏未能就他被驱逐出东京时日本人士所赠一万元中之八千元的用途作出报告时,章炳麟(当时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带头掀起了一场要把孙氏开除出同盟会的风波(第71—73页)。1907年晚些时候,另一场“分离运动”出现在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者组成的共进会内。这是那些发动了终于获得成功的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和首先响应革命的省份湖南境内运动的关键性集团之一。如刘氏所说,共进会“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一个竞争对手”(第76页)。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些对于孙逸仙领袖地位的挑战,到了1910年,他就干脆放弃了同盟会,而在旧金山和东南亚开始为一个新的中华革命党征集党员(第80—82页)。1910年中,孙氏路过东京作短暂停留时,宋教仁等曾要求他对这类行为作出解释。据那次谈话的一位参加者记述,孙的答复是:“同盟会早已瓦解。谁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都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宋要他解释这些话,他[孙]说,“会员居然攻击总理[即孙]。没有我,怎么能有同盟会?既

然全部经费都是由我筹集的，会员就无权过问，更不要说加以攻击了”（第 80 页）。基本上是对孙氏这种盛气凌人态度作出的反应，东京的宋教仁等从 1910 年开始酝酿，到了 1911 年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这是同盟会和那些后来发动武昌起义并终于获得成功的革命者之间唯一的联系环节。于是正统的历史著作就殚思极虑地要把它描绘成同盟会组织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其实，正如刘氏所阐述的，这是一个派别集团，它的宣言根本没有提到作为总理的孙逸仙，倒是承认集体领导的原则以为代替（第 96—98 页）。它在财政上和行动上都和同盟会的其余部分毫无关系。

然后，刘氏作出了比以往任何人更多的努力，以期能把孙氏和同盟会从他们在辛亥革命史的舞台上所篡夺的核心位置上逐出。但是不幸，他也犯了传统传记作家常犯的错误，而把宋教仁放到了历史的核心地位，并把他的中部总会看成是“武昌起义的中枢”（第 100 页）。在描述中部总会对华中革命分子享有权威性地位的“确凿无误的真凭实据”时，他提出了一份中部总会 1911 年 10 月 7 日的决议：“指令革命党人暂缓执行起义计划，以待时局变化”（第 101 页）。刘氏未能加以强调的是这一决议完全被忽视、而革命在四天之后就爆发了的事实。宋教仁的中部总会对中国国内各革命集团并不具有比孙氏和同盟会更大的权威。

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缺点，史扶邻、薛君度和刘基胜所著的这三部传记倒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能够借以分析海外革命党派的几种不同观点。但是没有一种是完全站得住的，只要读了同一事件的不相同的记述，这一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且以同盟会的建立这一关键性事件为例，史扶邻自然追溯到孙氏在欧洲发展留学生为会员的活动，而且认为，自始至终，毫无疑问，孙氏是领袖人物（1968：第 344—366 页）。而薛君度则强调孙氏之急于找到黄兴，指出孙氏要在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一名称中使用“革命”一词的愿望遭到否决，并着重说明黄兴的团体在新组织的领导机构里占有支配性地位（1961：第 40—45 页）。刘基胜的记述所强调的则是，留学生中

的革命分子早在孙氏于1905年到达东京以前就有了团结起来的意向、孙氏在留学生中起初的孤立处境，以及在问到革命的目标是民主制抑或是君主制时，他曾难以直接回答而态度暧昧等等（1971：第40—48页）。如果有人不得不（或被指定）只读其中一种，毫无疑问，应该选择的是史扶邻的记述。而薛君度和刘基胜（尤其是刘基胜）的著作则可以提供有重要矫正价值的观点以平衡他的说法。谁也不必担心这几种书的任何一种已在这个研究课题上作出了最后的结论。

### 对激进主义的探讨

随着对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所著《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1969)一书的评论，我们现在就要从政治性传记转向政界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是我们仍不能摆脱同盟会所统治的领域。该书的主要焦点聚集在汪精卫、胡汉民和章炳麟(他们全都是同盟会的代言人)这一类人物的身上。高慕轲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他的结论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激进主义是王牌’”(第248页)。更具体地说，高慕轲的论点是，“支配着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和政治的激进主义在1903到1908年间问世并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第ix页)。他对激进分子在那些年月所获“胜利”的描述，集中在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反满思想、无政府主义以及章炳麟那种传统种族主义、佛教平等主义和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独特混合物的发展和完备上。这是一部颇具才华的著作，如果有人希望对同盟会的《民报》所发表的各种观点有一个全面而概括的了解，高慕轲这本书就是个良好的起点。

高慕轲分析上的缺陷，我以为在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革命党人在东京发表的东西都应被看成是中国国内革命思潮的反映。而认为激进主义在1908年取得了某种引人注目的胜利这种看法，尤其使我感到荒谬。据我们所知，同盟会在那一时期从组织上看正

处于极为混乱的境地，而在中国国内，愿意认真考虑君主立宪，觉得不妨一试的人数正与日俱增。在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各种各样的）和赞成立宪政府（不论是君主政体或是共和政体）的思潮都确实在增长。在高慕轲看来，这大概就是“激进思想”在成长的证据，因为他愿意把梁启超的著述也包罗在这一范畴之内，理由是梁氏赞成“维新的目标”而且“希望彻底维新”（第236页）。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把“激进”的定义延伸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一方面，梁氏由于希望中国维新而被看成“激进”，另一方面，又把章炳麟和刘师培视为“激进”而不顾（或者正是因为？）他们对整个维新进程所持的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激进”一词在分析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此外，研究知识分子的史学家将永远有必要以实例向类似我这样的怀疑派证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理论在解释这些对象本身的行为方面毕竟是有些用处的。“激进派”在东京写些什么，我并不关心，除非所写的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在中国国内的作为。在这一方面，我们见到不少知识分子流亡在日本时曾写过无可否认是激进的文章。但是他们回国后的行动却表明，他们随时可以牺牲那些激进的理论，刘师培就是突出的一例。从1908年到1911年，他一直在一个清政府的满族官员端方门下效力。章炳麟甚至在1912年伙同几个维新派人物和前清官吏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来反对国民党。汪精卫在1911年从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似乎曾和袁世凯亲切交谈，以谋求确定一种能够为那个老练的官僚所接受的共和体制。其实在1911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激进派”营垒，因为人人都是以或多或少是平等的地位参加政治斗争的。到1912年，孙逸仙和他的多数伙伴均在呼吁全国团结起来支持袁世凯，于是人们又不禁要问：激进主义果真是政治行动中的“王牌”吗？也许，只不过是激进知识分子出版物上的“王牌”吧？与其对这一类疑问作过多的追究，倒不如读一读兰金的《中国的早期革命家：1902—1911年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1971)一书。这才是一本有关激进派的研究著作：谈论革命家的功绩，而不过甚其词；被称为激进的人物，看来都当之无愧。兰金从一开始就把“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加以严格区别，并且认识到，“有力量左右那次革命的，是立宪派人士和军官之流的人物”，而不是革命家(1971：序言，第2页)。她认为，激进思想从1907年起在中国境内就衰微了：

因此，具有浪漫色彩的激进思潮是辛亥革命的早期表现。这种思潮从未消失，但是就其影响而论，从1907年往后已日见衰微。而辛亥革命并不是那些激进派人物策划的结果。〔第6页〕

尤为重要的是，她为革命派人士在辛亥革命胜利中遭到的失败提示了某种根本性的答案。就1903年的《苏报》案而论，当章炳麟和邹容进行了煽动之后在很容易就可以脱逃的情况下坐以待擒时，革命派人士“为他们的事业赢得了广泛的注意，而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据以活动的机构”(第78页)。1907年，同样，“革命浪漫主义者”，如徐锡麟和伟大的女革命家秋瑾——有意识地按照游侠传统——“英勇就义”，为反满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却也不可避免地使革命家自己的组织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属于“和列宁主义革命家截然不同的类型”(第176页；并参阅第187—190页)。他们用以加速革命到来的策略，使他们在革命果真到来时必然无法从组织上加以控制。

这些受过传统经籍教育的上层阶级革命家和接受西方文明的基督徒孙逸仙不同。他们也不信服象宋教仁(他常常反对自己的同志愿作戏剧性牺牲的倾向)那种人对革命所采取的谨慎、耐心、有条不紊的做法(刘基胜，1971：第49页，第104页)。但是，我们发现，在浙江集团中，有些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同在中国境内活动的革命家们接近的程度超过了无论是孙逸仙或是宋教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兰金的记述中有好几个论题就值得当作对整个中国都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来加以研究。

首先，传统的历史著述一向严格区别革命派和改良派。这种